

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的若干思考

李宇明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1)05-0032-05

[收稿日期] 2011-08-15

[作者简介] 李宇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北京 100816)

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是国家语委首次向社会发布的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也是“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第一部。您在序言中谈到了要“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请您谈谈国家语言生活的构建情况。

李:“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一个新的理念。早些时候,人们一直希望语言生活纯洁,“语言纯洁观”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直到今天还有人为语言不纯洁感到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可能追求语言纯洁,现实中语言不可能纯洁,特别是充满活力的大语言。语言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群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语言内部很难做到匀质。希望语言能够纯洁的人,就总是看不惯一些新的语言现象,所以,语言纯洁观是非常有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陈章太老师、于根元老师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语言生活的“健康观”,从纯洁观到健康观,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进一步问,什么样的语言生活是健康的?健康的语言生活可能有很多表现,但从本质上讲,在现代,和谐是一种最健康的状态,所以,国家语委就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理念。

过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没有明确是管语言还是管什么,后来我们逐渐明确了,国家语委的主要工作是管“语言生活”,也就是管语言的应用问题,不是一般的、个人的语言应用,而是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语言应用。事实上,人类生活的80%是语言生活。因此语言生活的和谐对整个社会的和谐非常重要。

本世纪以来,社会语言观念逐渐多元,方言的问题成为主要的语言问题,民族语言问题、外语问题、繁体字问题、网络语言问题等,如果用以前的“纯洁观”来处理的话,不可能符合社会语言的发展规律。处理这些语言问题,需要有“和谐”的理念。

当然和谐不是一团和气,而是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行使着通用的交际职责,在国外代表着中国,发挥国语的作用。方言、民族语言、外国语,乃至文字上的繁体字等,在语言生活中也有着它们的地位。要在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观念的指导下,使我国境内的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和谐不是没有主次,只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但也不忽视民族语言、方言、外国语的作用,整个语言生活才能和谐。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实际上是怎么样处理好各种语言矛盾,解决好语言问题,发挥语言的各种功能。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绿皮书是语言生活的现实记录,通过它把语言生活的实态展现给社会。政府过去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现在要发生观念转变,除了管理还要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把政府

掌握的信息，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都可以公布出来与社会和学者共享。《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绿皮书就是在这个理念下来做的，这类社会服务可以称之为“语言服务”。语言学对本体研究比较多，对社会生活的关注较少，所以现在需要由政府来组织发布。以后关注语言生活的学科发展起来了，相关研究多了，研究机构、大学都可以来做语言生活的发布工作。

高：在中国首届语言生活研讨会上，有学者谈到绿皮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存在着落差，您怎么看呢？

李：我觉得对于绿皮书，经济效益不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但是让大家能够读得到、买得起是应该考虑的。目前有三个方面的制约：第一，对语言生活的关注还没有形成大的学术潮流。语言学的发展过去都是从语言本体学科发展而来的，如果关心语言生活，过去也主要是修辞学。后来才引进了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新的学科，但这些学科似乎处于中国语言学界的边缘状态。最主要的表现是，很多学生在读研究生前，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本科课堂影响不是很大。第二，能够从事这方面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及学科点也较有限，大家很难主动地去获取这些信息。第三，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获取信息的主要方法是网络，然后才是平面媒体。目前绿皮书利用信息化的手段较少，还没有能放到网上供下载使用。在整个发行和出版形式上还要做很多改革。

崔：教育部自2005年成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センター以来，每年对流行语、新词语、媒体用字用词等展开监测研究，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下编）》。若单看流行语、新词语等监测项目，都是很早就已有相关研究的，那么请问，将这些监测报告汇集成册的新意在哪里？您对“语言监测”这一全新概念的理解是怎样的？

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下编）》的主要意义不是发布新词语，是发布每年用字用词的基本状况。过去语言生活研究薄弱，谁都不清楚各类媒体用字用词情况，《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下编）》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当然如果能够对语法、语义、语音的情况进行监测就更好了，但是目前的技术手段还做不到。这些数据长期积累，是要给语言的历史留下一些数据，就像天文观测、潮汐观测一样，时时观察记录，长期坚持下去，对于学术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关于新词语的发布，现在仍备受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些新词语不规范，你为什么发布它们？有些人就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创造被社会记录下来。人们的生活阅历都是有限的，谁都难以全面了解每年的新词语。新词语是所“大学校”，通过阅读《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下编）》，可以跟着时代前进。我们是希望忠实地记录下语言的发展轨迹，同时也记录下真实的社会生活。新词语代表的是新理念、新事物，有时是新的表达。为此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专门谈了发布年度新词语的思考。

于根元老师曾经领衔做新词语的编年本。新词语不做编年本，它的记录价值要丧失很多。和英语相比，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看看现在的汉语词典，对于词语产生的具体时代，都很难说清楚。今天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什么不为人留下真实的词语产生的记录呢？据统计，现在一年最多能创造一千多词汇，其中有些只是昙花一现，真正能够稳定下来的大概有三五百个，其中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就更少。也是否可以说，民族的语言创造力也就是每年几千个单位，包括引进外来词。这能否也作为衡量思想的活跃度、民族的精神创造力的标准？这项工作的意义可能是多重的。很多学生已经利用这些资料，做出了一批学士、硕士、博士论文。这些材料就如同酒一样，时间越长，越醇香。

高：由国家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和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中国语言生活》电子期刊于2010年5月10日正式创刊了，您的印象如何？

李：我同于根元老师及商务印书馆方面都交换过看法。我觉得，于老师来担任电子杂志的主编，得其人，得其时。说“得其人”，首先，于老师一直比较关注语言生活的研究；第二，他曾长期在《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等重要刊物做过编辑和领导工作；第三，他对传媒语言及其规律也很

有研究。说“得其时”，是因为虚拟语言生活已经是我们语言生活的主要部分，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主导倾向。现在网络上的刊物多数是平面媒体的迁移，是把平面媒体搬上了网络。而《中国语言生活》电子期刊是纯粹的电子刊物，没有纸媒的依托。另外，如今整个社会，包括非常有学问的学者，腰缠万贯的富商，或者位居庙堂的官员，对语言状况，对语言与人类、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等几乎没有多少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界向社会来宣传普及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语言同国家同社会的关系，这是政府部门及语言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得其人又得其时，那这个刊物办起来就一定不错。我很喜欢看，每一期我都是在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对虚拟世界了解太少，有办平面媒体的经验，但怎么样办网络媒体，每一步都需要探索，每一步探索都面临成功或挫折。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话题。比如说，是不是把网络上应该有的手段都用上了。网络互动的手段（和以前编读之间的来信不同），多媒体的手段等。网络是个开放的资源，怎么样更好地认识网络的规律来办好这个刊物，需要探索。这件事我也更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人，他们对网络更加了解和精通。以前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就定型了，忽然云计算和物联网来了，“智慧地球”的概念提出来了，这一定会带来互联网的更大发展，也会对网刊产生无人能够料及的影响。可以说，《中国语言生活》电子期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一个创造的新机遇。我希望它越办越好，成为虚拟网络媒体刊物的领头羊。说到这部刊物的内容，非常好。它把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囊括其中，配以优美的音乐和图画，大家都评价很好。

崔：商务印书馆副总编周洪波先生也提到以后会办一个网站来推广这个杂志。

李：对，这是个很好的办法。我比较欣赏编者和网民能够互动的、和平面媒体也能够互动的方式。

崔：同是和中国语言生活相关，您觉得电子杂志和绿皮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绿皮书提供的是基本的数据和材料，需要进行二次开发或是三次开发。杂志除了原创的内容外，也可以对绿皮书或其他语言研究成果进行二次或三次开发。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制定过程中，我曾经明确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希望把语言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10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纪念朱德熙教授诞辰90周年，陆俭明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我的致辞是《大专家重视学术普及工作》。朱德熙先生的5卷文集中，4卷都是做的语言普及工作，包括怎么写论文。陆俭明先生的很多文章也是和语言普及有关的，最近他还出了语言演讲集。时下流行的话题“裸捐”，教授、博导都是知识的富有者，应该怎么样把“知识财富”反馈给社会？社会普及工作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教学，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途径。在会上我就设想，能否在某语言学会下面成立一个语言普及专业委员会，优秀的科普论文，大学里应该承认是科研成果。甚至还可以调整现有的评估机制，比如讲师想晋升副教授，副教授想晋升教授，都要有一篇优秀的科普论文。

希望能够组织一批人来做语言科普工作。过去于根元老师等人编写了《语言的故事》，后来改名为《语言漫话》，影响很大，社会的受欢迎度就说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最近于老师又有了新想法，要编写《新编语言的故事》，书名还可以再考虑，但是这个想法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呼吁语言学家来做语言普及工作。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国内语言矛盾逐渐突出，但是相关的研究不够。我们希望大的出版机构多出版一些普及性的读物，普及是有层次的。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给青少年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很多知识都是通过科普得来的。语言科普是国家语委必须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不能去抱怨社会语言知识的缺乏，对语言学支持不够，语言学的社会生态不是很好等等。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对语言生活关注了多少？研究了多少？为它服务了多少？很多学者近些年都是在书斋里，为社会服务不够。当然教学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但是毕竟受众的群体小。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崔：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否由于目前的教师科研评估机制中对于相关研究的重视不够？

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评价系统上，即是否把这方面的工作看作学问。另外一方面在学术取向上，要所有的学者都发表高水平的创新的论文，这不现实。学者怎样去服务社会？我们向社会捐献不同于商业捐款，没有“裸捐”的问题，因为我们拥有的是精神上的财富，是可以无限复制的。

崔：您在2010年第4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一文，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进展。

李：201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12期转摘了我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工作总结，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基于两个理念：

第一，是把现在的语言状况保存下来，这首先有助于了解国情。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发展太快，中国语言地图将进行大幅度改写。我们没办法去阻止它的发展，但是语言资源大量流失是很可惜的。我们现在有了先进的设备和手段，如录音、录像、GPS定位系统等，应当运用这些手段把现在的“语言地图”保存下来。第二，是这个有声数据库建立起来后，对于语言信息化作用非常之大。用这个库的语料去训练机器，可以让机器去了解各地的方言，了解中国的民族语言。人类最终要用口语方式和机器交谈。一个国家的实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国家处理海内外事物的语言能力，是其中一个。再如地方普通话的情况，这是过去调查得不够的，它是人民大众交际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方式，将来要实现人机交谈，就需要让机器听懂地方普通话。这是给子孙后代造福的、既利国又利学的一件大事。

建立有声数据库引进了一套现代技术和方法，把语言学的田野研究从结构层次推进到话语层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学术推进。原来的调查主要是语音和词汇，而现在语言结构是“备忘”性的，调查它是为了更好地记录话语，理解话语。话语是语言真实的状态。语言是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研究的本体是话语。话语中蕴含着人类的情感和文化，它真正是语言和社会的结合。但是目前这项工作的推进非常困难。我们国家是语言不敏感型国家，比如，几千年来，阿尔泰语系对于汉语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古书上找不到阿尔泰民族语言的像样的记载。我们历来只重视书面语，对口语不敏感，口语文化从来没引起我们大的重视。所以，现在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是有原因的。

崔：在保护语言资源的工作中该如何解决人才储备的问题呢？

李：当前人才是个大问题。进行田野调查，要尽量运用现代技术和手段来弥补人才方面的不足，录音录像及计算机智能处理也起到部分弥补的作用。我们甚至考虑过，这项事业如果要展开的话，可以专门成立中国语言调查队，调查队招收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语言学专业的学生，经过系统训练后分赴全国各地从事调查工作，算是参加了国家科研工作，增加了阅历，也为以后的就业提供一些机会。这项调查原则上一县一点，实际上方言、民族语言复杂的地区一个县是不止一个点的，全国大约几千个点。现在是在摸索经验，建立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高：您对于中国语言生活的相关研究还有哪些比较关注的问题？

李：首先是语言认同问题。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语言对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区认同有一定作用。我们的理想是，通过语言和其他方面的教育，能够建立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比如，处理好普通话与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的关系，这对于民族认同、地区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有什么影响？过去讲语言认同，多数只讲民族认同，甚至只讲地区认同。有人提出要把方言当作母语，我不同意。我曾写过一篇《论母语》的文章，认为普通话是母语，因为它是民族共同语，方言是母言，这两者并不矛盾。

第二个较为关注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城市化带来了人口大流动。流动的方向基本上是西部向东部流动，农村向城市流动。城市的语言规划内容之一，就是能够容纳不同的族群甚至外国人在此很好地生活，目前城市的语言规划比较缺乏。有人研究过移民的语言，我认为现在应该研究

城市语言，这是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如何过好虚拟语言生活。所谓信息化，其实就是把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进行“大挪移”。比如说，把现实语言生活搬到虚拟语言生活中时，有些可以搬，有些搬不进去；有些在搬的过程中会变化；有些现实语言生活中没有，是虚拟空间新产生的。首先要解决“大挪移”问题。比如说辞书，就不能只满足于纸媒辞书，要发展网络辞书。再如报纸、政府公告等等，要把现实语言生活有步骤有计划地搬进虚拟空间。其次，有人认为网络语言生活就是年轻人在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其实需要研究虚拟语言生活的规律。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4亿，在世界上占第一位。中国走向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定是网络和网民。我们没有把网络和网民看作中国走向世界的排头兵、先遣队。我们对网络还是半信半疑，管管收收。过好虚拟语言生活是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靠现在的网民素质行不行？靠现在的网络管理行不行？我们需要制定关于网络的游戏规划，培养网民的素质，不能仅仅把网络作为一个新的媒体来对待。

第四，中国话语权问题。首先是国内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问题。目前国内很多话语权的表达方式不合适：用上访的方式、用集会的方式、用网络语言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话语权，不是良性的，应该用法律的方式、理智的方式来表达话语权。领导干部的话语方式，有“假大空”的倾向，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其次是中国国际话语权，这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但也必须主动争取，不能坐而等待。要了解国际话语方式，使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能够让人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去。

战略与对策研究、语言国情研究，我认为是中国语言生活当前最重要的研究。语言研究有三个层面：最高层面是语言与人类的哲学层面研究，中观层面是语言与社会，微观层面是语言与个人、是语言本身。现在我们在最宏观的层面和最微观的层面都有研究，唯独中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因而也影响到上层和下层的研究。这里所说的语言与社会，还不仅仅是拉波夫的微观社会语言学，而主要是费什曼（Fishman）的宏观社会语言学。我们出不了很高层的语言理论，就是因为中层的研究没有跟上，同时也带来了语言决策上的一些迷茫。

高：您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序中曾经谈到国民语言能力标准有几个关键点，其中之一是多语种能力应尽量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而我国的中小学，包括大学，外语学习实际上只是学英语，您怎么看？

李：外语教育走到今天不容易，仍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可，尽管行动上认可，理性上是不认可的。有人认为它破坏了母语的纯洁性。我们现在提出了“国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的语言能力。从国家语言能力来看，我们是语言能力非常弱小的国家，要提高国家语言能力，首先要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我们目前还是不自觉地在采用“单言单语社会”的评估政策，其实中国国民的语言能力应当是“多言多语”的。我们外语学界很少有人意识到，提高外语学习效率和做好外语学习规划，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更为重要。中国的外语语种规划不断出现问题。最早是以俄语为主，今天以英语为主，仍然没有多语种的概念。外语学界应该承担起外语规划的任务，并且要注意培养多语种复合外语人才的问题。我国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做过一个外语规划。外语对中国走向世界十分重要，至今却没有新的外语规划，这太可惜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八个大字。全国这么多外语院校，应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做好外语规划，是外语学界的重要任务。

（高媛媛、崔乐采写）

【责任编辑 李开拓】

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的若干思考

作者: [李宇明](#)
作者单位: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北京, 100816](#)
刊名: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11, 12 (5)
被引用次数: 1次

引证文献(1条)

1. [张先亮](#), [赵思思](#) 试论国民语言能力与人力资源强国[期刊论文]•[语言文字应用](#) 2013 (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hdxxb-shkxb201105008.aspx